

壹、前言

一、批判思考於成人的重要性

身處於現代社會需面臨多元而複雜的生活環境，如何培養未來公民能適應成人生活、改善所處環境與解決問題，是相當普遍的需求；尤其在成人前期之大學生，以學校所安排的學習環境來說，教師如何帶領學生養成「終身學習的習慣和能力」成為一項首要工作。以「學習的能力」而言，如何使學生能敏銳地察覺問題、鑑別資訊的真偽和品質、養成獨立思辨及反省的能力，以及如何面對各種論述能客觀地做分析、推理、評價等思考，使所學的知識及經驗能經過理性的思辨轉化成有用的智慧，這些學習的能力和「批判思考」皆有密切關係（沈家平、陳文典，2004）。

從認知發展的歷程來看，關心人類吸收知識、認識世界的架構，重要的貢獻者Piaget（1970）提出認知發展理論，發現兒童到青少年期有四個階段：感官動作期、前運思期、具體運思期及形式運思期；而後Inhelder、De Caprona與Cornu-Wells（1987）再指出，此四階段不能涵蓋人類認知發展的全部歷程，形式運思期後宜增加後形式運思（postformal thinking）期作為第五階段，因有些成人可以發展後形式運思期，最大特徵在於對信念及價值體系的反省與判斷，且更重視情境脈絡因素。根據Kramer與Woodruff（1986）關於後形式思考不同模式的歸納，成人認知發展的研究者普遍認為後形式思考包括「相對性思考」與「辯證性思考」兩種不同的認知思考形式。此類型的思考具分析評鑑與解決問題等多重運作，正是批判思考的運作。

進一步探究，溫明麗（1997）認為，批判性思考展現的辯證性心智活動——質疑、反省、解放與重建——對處於不確定的恐慌或嘗試錯誤的無力感中的人類，的確能產生激勵作用，因為人類至少能在不確定的價值觀

中有序地思考，不致於毫無方向地嘗試錯誤。

將批判思考視為主要的基本能力（generic abilities）的構想，不約而同地出現在英國、澳洲、紐西蘭、北美洲等國家的政府報告書中，甚且世界各國對於批判思考教學的重視，使其列為國家的教育目標（引自蘇明勇，2003）。國內許多大學亦將批判思考能力列為重要的通識能力（楊雅婷，2005），以在成人前期前瞻性地培養公民素養。

關於如何提升批判思考，在教育領域累積了相當多教學現場之研究與文獻，如Angeli與Valanides（2009）將之歸納為三種取徑，從單獨教授一般批判思考技能（general approach），轉為融入學科中教學（infusion approach），到浸入式教學法（immersion approach），重視學習者對話，分析與評鑑不同的觀點。

研究批判思考的流變，呈現三種取徑的核心價值變化，變化原因在於增進批判思考技能之外，尚需考量成人生活面臨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、各種情境的決策時，對相關知識的基礎掌握能力，決定性的影響著能否運用批判思考以解決問題；更甚者，進行決策解決問題之成人，其認知過程中的個人特質（如意向）左右著批判思考心理歷程。因此，近來為批判思考定義內涵時，廣泛強調批判思考的技能、知識及意向，三者均在批判思考運作時有鼎足作用。

二、批判思考於傳播教育

雖然批判思考轉向融入學科中教學已有相當時間，不過在作為培養現代社會中傳播、守望與監督的媒介人才之傳播學系卻很少有相關研究。應用批判思考教學於與大眾媒介相關的教學活動，多屬於作為閱聽人角色之媒介素養提升（李承宇，2002；林芳瑜，2009；林作逸，2006）。

二十世紀末期以來，國內有關傳播教育內涵與知識的諸多討論，多指出過往課程結構中，忽略思考分析能力的重要性。例如，陳韜文（1999）指出，思考分析能力是傳播教育之根本，因為對思考分析能力的培養作用